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 一 弓

ZHANG YI GONG

代 表 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一弓代表作

顾传菁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一弓代表作

顾传善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1 字数 318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0

ISBN 7-215-01520-3 / I · 103 定价: 9.40 元



作 者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翠儿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亩地玉米的糊搅到那口装了半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咽了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陈水鱼萝卜。

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管堂的总保管老和叔，蹲在米老面子的草房檐里，偷哭起来：“老天爷呀！唉……”“饿呀！眼吧，……”“不能叫俺再吃这饭了，唉……”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和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是传染给那些端着饭碗来食堂讨汤的毛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养孩子喊饥的年轻的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忍不住哇哇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锤从大队部跑回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在伤身体哩。眼睛不用去公社问，说不定给锁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G0766/4503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九年前，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它以题材的独特、矛盾的尖锐、思想的深邃和色调的强烈，震惊了文坛，它的作者就是张一弓。

张一弓于一九三五年元月生于河南开封，父亲是原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是高中语文教师。他自小酷爱文学，在富有文学氛围的家庭中成长。一九五〇年，他在开封高中的写作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经学校介绍，到《河南大众报》（办给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看的通俗报纸）当记者，那年他才十六岁。一九五六年八月，张一弓入党。一九五六年十月，《河南大众报》与《河南日报》合并后，他到河南日报社工作。同年，发表小说，梦想着为文学事业作出贡献。谁知，一篇题为《母亲》的短篇小说，招来了祸害，受到无休止的批判。因为他的母亲被定成“右派”，儿子写母亲，自然是“为右派母亲唱赞歌”。此后，他只好遏制对小说创作的冲动，全身心地转向新闻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被关入“牛棚”，受过批斗，也曾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幸运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有机会到农村工作，担任登封县卢店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亲身参加了我国农村以实行联产承包制为其主要标志的历史变革，亲身经历着我国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深刻变革。这段难得的可贵的经历，使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建设者和战斗者的身份，毕竟与旁观者不

同。他有那么多独特的和深切的感受、体验要表现出来，这样，中辍二十余年的文学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他人到中年时，重又挽起艺术之弓射出的第一箭，命中目标了。如果没有卓越独特的识见，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难以写出这样好作品的。人们发现和承认他是个好射手，他手中的那张弓，是件锐利的武器。几年来，他一发而不可收地连续写出了《赵锨头的遗嘱》、《张铁匠的罗曼史》、《山村诗人》、《流泪的红蜡烛》、《山村理发店纪事》、《火神》、《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孤猎》等十四部中篇小说，和《黑娃照相》、《寻找》、《牺牲》、《瓜园里的风波》、《最后一票》、《翠翠》、《挂匾》等十几个短篇小说，约一百余万字。其中，《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和《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均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对他的创作，给以高度的赞赏和肯定。张一弓深有体会地说：“没有三中全会，就不会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就没有我张一弓！”他还说，“如果没有生活对我的直接教育，没有这场变革的实践给我带来的认识上和感情上的变化，便没有我从《赵锨头的遗嘱》开始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张一弓：《听命于生活的权威》）是的，是时代造就了这位勇于追求并卓有成就的作家。

张一弓常常提醒自己：“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张一弓：《听从时代的召唤》）

如果我们将张一弓九年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按写作年月排

列起来，可以看到，我国农村在怎样一步一步地前进。他的小说，像是一面面镜子，映现出今日农村结束饥饿和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崭新面貌，映现出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正在展开着的伟大经济变革的历史必然性，映现出当代农民对精神文明的渴望和追求。罗曼·罗兰在《论作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中指出：

“伟大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时代通过这只眼睛来看自己，并且见到了自己。”这大概是包括张一弓在内的当代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们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张一弓的作品，大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他关注和思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长期的记者生涯和在农村工作多年的经验，使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理解农民，在他的作品里，较好地体现了当代农民的意志、愿望、感情和理想。

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作者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大胆地揭示了“大跃进”及其以后那一段严酷历史的“伤疤”，真实地惊人地反映了“大跃进”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导致农民缺粮、断炊，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了当时汹涌恣肆、泛滥成灾的左倾思潮，并追溯、寻求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卡·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张一弓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的忠诚，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是为了这样的生活永不返回。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无私无畏的富于牺牲精神的李铜钟形象。他既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哄抢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这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身份，竟统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所以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囚犯，恰好是因为他是一名真正为了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这就非常尖锐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奇特的惊人的矛盾。是特有的时代酿成了李铜钟的悲剧。李铜钟倒

下了，可是他的光辉形象，却像铜钟一般，经得住时间的经久考验。李铜钟离开人间时的最后呼喊：“救救农民吧！”像历史的钟声，在人间久久回响。

拯救农民，叫种粮食的吃上粮食！终于，“治穷”的道路找到了，那就是真正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的联产承包制。张一弓于一九八〇年到河南省登封县卢店公社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源于群众的伟大创造。《赵镏头的遗嘱》，就是他亲身经历这场农村现实斗争生活的产物。

在《赵镏头的遗嘱》中，作者艺术地记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这场变革首先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以赵镏头等贫苦农民为一方，同龚大平这个思想僵化的地委领导人，和李保等附着在“大锅饭”的锅沿上的基层干部、懒汉、寄生虫等，围绕着联产承包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这是有关十亿人民命运的大事，是一场真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品塑造了一个智慧和勇敢的赵镏头形象，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捍卫了农民的利益和他们的历史创造。作品对农民为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热情的颂扬和肯定。赵镏头死后，县委书记林慧说：“我们这些穿四个兜蓝布褂褂的人，过去往农民那两个兜里掏东西掏成了习惯，成千成万地掏，掏得越多越革命。而一旦那两个兜里刚刚要装进一点东西，我们的一些职业革命家立即惊叫起来，好像那两个兜里潜藏着资本主义的酵母菌，会使任何东西发酵、霉烂、变质，变成资本主义的妖精。”这段反思历史、反省自己的透彻话语，帮助我们认清了这场斗争的实质，而那不能让赵镏头同志“去另一个世界继续当一个贫农”的呼喊，则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上造成了强烈的震颤。

遗憾的是，正像一些评论家所作出的分析那样，赵镏头自杀

的结局处理，有人为的痕迹。虽然作者说，这是他有感于邻近公社一个生产队，因推翻承包合同而使得一对农民夫妇喝煤油自尽的事情而写的。然而，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毕竟不同。作品里的赵锺头，是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能看出历史趋向的共产党员。在他性格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包含自杀的必然因素，而小说中所描写的他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也没有提供这种结局的必然条件。作者为了强化主题，为了追求人物命运戏剧性的高潮，人为地去激化矛盾，硬是将人物纳入自己主观规定好的框子里去。这一艺术失真，多多少少影响了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去思考，那么联产承包制的创造，确实是伴随着农民的血与泪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所描写的挣扎在饥饿线和死亡线上的李家寨几百口村民们，还有西门外支起的三口大锅和卧龙坡车站上挤满着等着扒车逃荒的社员们，以及出现在这幅背景前面的犯人李铜钟，不都是可以视为联产承包制诞生以前，历史向农民索取的血与泪的昂贵代价吗？即使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行联产承包制决定颁布之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又何尝不是尖锐的斗争？在斗争中，血泪相和的事件总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何况《赵锺头的遗嘱》是写在中央决定颁布之前。它的缺点主要的是艺术上的缺陷。所以，这份带血的记录，还是值得保存和阅读的。

《寻找》，《张铁匠的罗曼史》、《黑娃照相》，《最后一票》，均写于一九八一年。此时，那赵锺头为之牺牲的，让农民和土地“恋爱”，叫劳动跟幸福“结婚”的新政策，已在逐步推广，并初见成效。农村在变，农民的心理也在变。张一弓及时地记下了农民刚刚赢得这种新生活时那种亦喜亦惧、尚不安稳的心情。《寻找》是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马套的农民在

集市上丢钱、寻钱的故事。在这个简单的小故事里，蕴含着深沉的内容。它是一篇用饱含哲理的诗一般的语言写成的政治抒情型的小说。请看，作者写道：“马套啊，寻找吧！你失去的已经太多，而你得到的只是刚刚得到。”“寻找吧，马套，忘掉过去，寻找今天吧！”“这是一次痛苦的寻找。他没有找到失去的财富和同时失去的美好的憧憬，却只找到了历史的忧伤和现实的不幸。”“去劳动中寻找自己吧，马套！……赶快振作起来，去劳动中寻找你美好的未来吧！”可是马套在想，今年丢了，明年还能挣回来吗？他“掏出一枚唯一幸存的五分钱的‘钢镚儿’，‘丢了下去’，想试一试‘命运的裁判’”。这一细节，读着令人辛酸，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再变”的不安心理。《张铁匠的罗曼史》以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从张银锁和王腊月之间忠贞和凄婉的爱情故事的细腻描写中，去探索和表现农民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曲折而离奇的“罗曼史”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路线、政策紧密相关。张铁匠不敢在“铁匠专业户定工定值合同书”上按指印儿，正是他几十年生活经验在心理上的痛苦反映。小说给这个悲剧以喜剧结尾，在张铁匠夫妇的复婚之夜，他们和儿子铁拴一起，在合同书上“按上了一家三口的指印儿”，以表现农民对新生活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黑娃照相》，是作家机敏地从迅速流动着的生活中拍摄下来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镜头，描写了十八岁的黑娃被新政策所鼓涌起来的一种心劲儿，他有许许多多物质的和精神的追求，可眼下只有八元四角钱，太少了。他说：“再过两年，咱来真个的！”他望着山下的庙会，望着那鳞次栉比的货棚、饭铺，大声喊叫着：“你们——统统的——给俺留着！”写出了农村新一代农民对新生活的喜悦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最后一票》则是从另一角度的思考，

要想捍卫新生活、新政策，就必须重视和捍卫手中的民主权利。

不到两年，在《流泪的红蜡烛》里，主人公李麦收就“来真的”了！这个新时期的“种烟状元”，用两亩地的烟钱娶来了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可是，在这新的“真的”里面却包裹着一颗旧的内核，那就是精神的贫困与落后。这种精神的贫困与落后是可以使喜剧变成悲剧的！《流泪的红蜡烛》，是作家根据生活里一个刚刚发生的新娘哭嫁、拒婚的真实故事写成的。张一弓以他特有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敏感，从这场闹得而又荒谬的婚姻破灭中，发现了农村青年正萌发着的一种新的历史追求。新娘白雪花在新婚之夜的“俺是人！是人！是人！”的愤怒而悲伤的呼唤，终于使被严酷的人生扭曲过的新郎李麦收醒悟了，他主动解除婚约，面对着乡亲们，他大声地说：“我李麦收，还有你们，大嫂子们，小兄弟们，也都不能忘了，咱也是人，是人！要是前几年咱把咱这‘人’给忘了，眼下就得想起来，赶紧！”是的，人应当有个人样，人再不是羔羊，可以任随命运摆布，人再不是吃粮食的牲口，可以不去思想。人应该有美好的道德、情愫，应该有高尚的爱情，还应该有崇高的精神追求。《流泪的红蜡烛》的发表，标志着张一弓作品的主题开始由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描写农民摆脱物质贫困的抗争到反映农民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精神文明的转换。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生活，很有特点。作者真实地记录了农村刚刚出现的物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而精神生活依然“贫困”的矛盾，他大胆地给读者描绘了一幅新的与旧的、文明的与落后的、科学的与愚昧的、高尚的与低下的、社会主义的与封建主义的掺杂在一起的色彩斑驳的生活图画。这一些似乎会使人感到有些不协调，但又不能不承认，它却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流泪的红蜡烛》开首第一页所描绘的

“种烟状元”李麦收的奇特的迎亲仪式，可以说，具有社会学和民俗学的价值。

一九八四年，《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发表了。此时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联产承包制已经扎根开花，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许多剩余劳动力正离开土地去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作家自己也承认，即使在一年前，也难以想像驾驶汽车的农家姑娘会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在一九八四年春天，他却有幸结识了六个“汽车运输专业户”的司机姑娘，她们是真正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她们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的灵魂。春妞儿是她们的艺术典型。杨春妞已经不像《流泪的红蜡烛》中的白雪花，只会发出“俺是人！是人！是人！”愤怒而悲伤的呼唤，而是以她自己的行动，博得了人们的尊重。她是全地区司机考核的头名状元，她行为端庄，作风正派，不怕那些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诽谤，她不愿再去当“顺民”，不愿为了让别人看着顺眼，而舍了小戛斯。她那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地位，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某些不公正的所谓“合理现象”所作出的抨击和抗争，是令人深受鼓舞的。这篇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在人的性格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又是最主要的内容。再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农民了。在春妞儿身上，我们看到了新型农民所具有的新气质、新观念和新的精神世界。

《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又一次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作品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探究新时期农村人们的精神领域。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物质富裕，不仅要有所作为，还要去寻求那早已被人忘却了的最珍贵的人格与尊严。虽然寻找的步履如此艰难，但他们还要去寻找，应该去寻找！李麦收在

《流泪的红蜡烛》中曾经喊出的：“要是前些年咱把这‘人’给忘了，眼下就得想起来，赶紧！”在这篇新作中，宋福旺作出了回应：“把人样找回来！”《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艺术地再现了宋福旺怎样在历史的云烟里失落了自己，又怎样找到了另一个自己。“人”字，虽然很好写，只有两笔，可是做人，却很难很难。小说“记录”了我国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经济变革所引起的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它正在涤荡旧世界遗留下来的种种精神污垢，中国农民做一个真正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份份“记录”翻过去了。在中国的作家中，赵树理和柳青最有资格代表农民，那么要艺术地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的面貌和心理时，怎能忽视和忘记张一弓所撰写的这一份份深深刻上时代烙印的艺术“记录”呢？

张一弓的这些“记录”，有着鲜明的特色：一、从生活中来，作品中许多人物都有其生活原型。作品是受现实生活的触发而写的，绝不是向壁虚构的产物，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可贵的真实感和新鲜感；二、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时代风云息息相关。他的作品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小摆设、小玩意儿。他每一篇小说的发表，几乎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或大或小的反响；三、作品中渗透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即使在一个短篇中，也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结上去把握生活发展的轨迹，现实性和历史感融合在一起。仔细看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是相通的，互有联系的，像是系列小说，像连续剧。作品的主题，在随着生活的演变而转换、深化。四、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自己的眼睛，听命于生活的权威。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是他在生活中的新发现、新思考。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他是一个开拓者和创造者。因此，他所撰写的这一份份“记录”，就具备了独特的价值。

张一弓的作品，不是牧歌，也不是小夜曲，是一首首震撼人心的命运交响曲。他将写人，写人物性格和命运，作为自己作品的艺术追求。

在他约一百余万字的作品里，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农村人物形象，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生活画卷。有地、县、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干部，也有普普通通的庄稼人；有为民牺牲的共产党员，也有榨取农民血汗的“败类”；有带领劳动群众致富的农村改革者，也有阻挡农村变革的“绊脚石”；有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命运、地位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农村新人，也有尚不觉悟、安于现状的芸芸众生。

在这些众多的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生活的强者。如：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赵锺头（《赵锺头的遗嘱》）、郭亮（《火神》）。他们都有一个曲折、坎坷的命运。他们的性格是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表现的，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的，是在生死存亡、荣辱升沉、变幻跌宕的际遇中展示的。作品表现他们在逆境中的奋发和抗争。他们是中国农村的脊梁。他们的意志，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他们的感情，代表着人民的感情，他们的理想，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向。作品通过塑造这些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主题，表达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永恒的主题。这些人物性格的基调鲜明而强烈。不足的是，对他们丰富的内心活动还揭示得不细微、不充分。尤其郭亮，心理过程简约，影响了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宋福旺（《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是另一种类型的强者。他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但在他的灵性里却掺杂着许多不是一眼能看穿的复杂的东西。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作家似有意将作品外部情节结构和内部